

# “俄罗斯学”在中国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Е



主 编 / 李永全

副主编 / 庞大鹏

# “俄罗斯学”在中国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Е

主 编／李永全

副主编／庞大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学”在中国 / 李永全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201-1777-7

I . ①俄… II . ①李… III. ①俄罗斯-研究  
IV. ①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9547 号

## “俄罗斯学”在中国

主 编 / 李永全

副 主 编 / 庞大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祝得彬

责 任 编 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36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1777-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 中国“俄罗斯学”

李永全

“俄罗斯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是俄罗斯文明的结晶。与此同时，“俄罗斯学”在中国又是一个新兴学科，以全面系统研究俄罗斯为标识的“俄罗斯学”伴随着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兴未艾。

什么是“俄罗斯学”，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目前并没有统一意见。俄罗斯人在使用相关概念时，术语也不统一，如 *rossiеведение*, *руссистика* 等。从构词形态上分析，*руссистика* 主要应该涵盖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及哲学等，是狭义的俄罗斯学；而 *rossiеведение* 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俄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与文化活动，即与俄国有关的所有人文学科领域，是广义的俄罗斯学。

过去国内对俄罗斯的研究是按照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语言、文学等学科划分的。近年来，中国各外语院校和综合大学的俄语系在俄罗斯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提出了“俄罗斯学”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也将“俄罗斯学”作为优势学科进行规划。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民族性格都带有鲜明的个性。研究俄罗斯问题不能孤立地研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多学科多角度认识和研究俄罗斯是我们倡导的研究路径。



根据这一理念，我们认为，“俄罗斯学”是一门综合性研究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学科，是关于俄罗斯的总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它的研究范畴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战略、安全、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这与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这一广义的“俄罗斯学”概念不谋而合。

中国“俄罗斯学”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与中俄关系的发展历史密切相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曾几何时，为探索救国之路，一代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去十月革命的故乡寻求真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几乎全盘照搬苏联发展模式、发展经验，苏联也给予中国巨大的经济援助，留学苏联的中国学子数以万计。苏联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在现代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无不深深地镌刻上了苏联痕迹。

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后，中苏关系变成中俄关系。俄罗斯是各大国中与中国战略处境最为相似、战略利益最为相近、战略理念最为相通、战略优势最为互补的世界大国，也是对中国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影响最直接、最重大的世界大国。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25年来，中俄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俄双方都认为当前的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堪称“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学”的学科价值尤为重要，学科地位不言而喻。

中俄（中苏）关系是一部丰富、复杂和宝贵的历史。两国在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经历了结盟、对抗和一步步走向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代代“俄罗斯学”专家的命运也随着双边关系发展的节奏跌宕起伏。但是，历史上无论中俄两国关系变冷还是变热，“俄罗斯学”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整理出中国“俄罗斯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不仅对每个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单位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中俄关系史的丰富和补充，尤其是要向那些毕生从事“俄罗斯学”的前辈致敬。

编辑和出版《“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的初衷是“抢救历史”，主要是中国“俄罗斯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建所 50 周

年活动期间，我们发现能够把研究所发展史阐述清楚的人已寥寥无几。在我曾经工作多年的中共中央编译局，情况亦是如此。撰写中国“俄罗斯学”的发展史已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当我们把出版《“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的想法向同行和朋友表明时，得到了一致的响应和支持，大家都感觉到了厚重的历史责任。我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国内的俄罗斯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的名单，并向这些机构发出了约稿函。即使努力穷尽所有研究和教学机构，挂一漏万也在所难免。我们未对文稿体例做刻板规定，毕竟各单位情况千差万别，统一体例或许会束缚写作者的思路。我们认为只要尝试写出一部涵盖各单位“俄罗斯学”发展大致脉络的文集，“抢救历史”的尝试就不失为拓荒之举并首战告捷。

令我们欣喜的是，大多数来稿都写得非常精彩。通过这些篇幅并不太长的稿件，我们似乎看到了“俄罗斯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虽然几乎所有稿件都未以人物为中心撰写，但是一个个为中国“俄罗斯学”发展呕心沥血的前辈的形象已跃然纸上。从这些稿件中我们也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中央编译局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翻译、传播的历史。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史都是由与该学科发展息息相关的代表人物、经典著作和典型事件组成，《“俄罗斯学”在中国》也不应例外。略显遗憾的是，收入本文集的稿件在这方面稍显欠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相信这点不足会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弥补，毕竟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已经始于足下，它一定会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学”发展

历程	庞大鹏 高际香 柳丰华 赵玉明 薛福岐	/ 1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学”的发展历程	靳会新	/ 28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发展历程	李明滨	/ 53
中央编译局的成立与发展	高晓惠	/ 81
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学”的发展历程	关雪凌	/ 94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学”：历史、现状与未来	戴桂菊	/ 111
面向新时期的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	隋然	/ 124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学”的发展历程	万青松	/ 134
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的发展历程	徐来娣	/ 150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语言教学与研究回顾	杨波	/ 184
四川大学“俄罗斯学”发展历程	李志强	/ 199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崔铮	/ 208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学”发展历程

庞大鹏 高际香 柳丰华 赵玉明 薛福岐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属于国内最早对“俄罗斯学”学科展开研究的一批先行者和实践者之一。21世纪初，“俄罗斯学”作为独立学科被国内学术界提出。如今，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已召开过多次全国性“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经过十余年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俄罗斯经济”学科、“俄罗斯外交”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国内俄罗斯研究界同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 一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是在原有的“苏联政治”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起来看，政治学科在建所五十年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学科准备阶段、学科初创阶段、学科调整完善阶段以及重点学科建设大发展阶段。

### 学科准备阶段（1965—1980年）

苏联东欧所是20世纪60年代中央决定新建的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同时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苏联东欧国家的机构。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出现了动荡、分化和改组的新局面。在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着反帝反修、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三大任务。新形势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

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就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发表讲话。他指出，在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现状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研究，必须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仔细的分析。他列举了应着重研究的国际问题，其中就包括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正面和反面经验。<sup>①</sup>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得以建立。在这些准备新建的研究机构中，就包括苏联东欧研究所（简称苏东所）。该研究所以研究苏联为主，同时研究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需求而言，苏东所研究的重心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主要包括关注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人事变动、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等。这一时期的积累也为以后本研究所政治问题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是政治学科建立的准备阶段。

### 学科初创阶段（1981—1991年）

1981年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其工作出现了较大变化。第一，完成了从“中联部”到“社科院”的过渡，从以形势分析、政策分析为主过渡到把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发展，强调研究工作的学术性。第二，制定了两个“面向”的建所方针，即面向中央和面向社会。第三，开创了研究所对外开放的繁荣局面。政治问题的研究伴随研究所上述工作的变化进入了学科初创阶段。这个时期的研究所，按学科原则设立了苏联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理论四个学科和相应的研究室，按地区原则设立东欧学科和相应的研究室，形成苏联东欧学科。在这一阶段，作为国别研究的重点领域——政治学科的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政治学科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精神文明建设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些

<sup>①</sup> 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7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27/content\\_2514708.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27/content_2514708.htm)。

研究有助于了解苏联成立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基本国情，同时政治学科也积极配合研究所率先在国内开展研究中国对苏关系及整个对外政策的调整问题，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积极调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一阶段，苏联政治研究室的研究课题有“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中的若干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主和法制问题”“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国内政治形势”“苏联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苏联理论研究室研究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研究课题有“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综述”“列宁关于反对国家官僚化的理论与实践”“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概述”“苏联的精神文明建设”等。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开创性甚至具有学科奠基性。学科初创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

### 学科调整完善阶段（1992—2002 年）

1991 年，苏联解体，苏联不复存在。15 个加盟共和国都成为独立国家。除 5 个中亚国家之外，俄罗斯、乌克兰等 10 个国家均在欧洲东部地区之内。“东欧”这个地理概念涵盖了上述 10 国的地理范围。当时，我国外交部、新华社等单位也用“东欧”这一概念泛指原来的苏联东欧国家。因此，从 1992 年 1 月起，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但是，“东欧中亚研究所”这个名称并没有将研究所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俄罗斯”强调出来。直到 2002 年 10 月，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该所名沿用至今，加上 2002 年开始推行重点学科管理体系，因此，我们认为，1992—2002 年可以被视为政治学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明确的学科设置。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变了研究所的学科建设重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重点研究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剧变之后，研究所面临崭新的研究任务，也为政治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转型学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所谓“现代文明”社会转变。这样的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还未曾有过。这是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地区人民自己的选择。毫无疑问，不管这种转变是顺利还是遭受挫折，是成功还

是失败，都会在人类社会活动实践的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角度看，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同我国接壤，涉及我国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研究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的基本国情，即这些国家的政治、历史、民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基本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研究所对学科设置进行了很大调整。1992年，对全部学科和研究室进行了调整：撤销原有的苏联东欧学科及其各个分科，设立东欧中亚学科及其相应的各个分科和研究室，其中，按国别原则组建俄罗斯学科并成立对应的俄罗斯研究室，政治问题研究被纳入国别研究总的框架内。

苏联解体前，我国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主要是对苏联整体进行政治方面的研究，而对其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的研究尽管也有涉及，但总的情况是俄罗斯政治的研究包含在苏联政治研究之中，并且一般更注重对联盟中央政治形势、政治斗争的研究，而从1985年到1991年，这方面的情况的确是必须加以重点注意的。因此，对作为苏联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的研究明显不足。主要表现是，以对叶利钦等民主派与苏共和联盟中央之间的斗争的研究为主，而对俄罗斯本身的研究，包括政治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对俄罗斯联邦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研究也是从苏联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对俄罗斯的联邦制，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些空白。

苏联解体后，1992—2002年，俄罗斯开始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并受到极大重视，“俄罗斯政治”学科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俄罗斯独立之初，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形势错综复杂。本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分析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重点是研究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国家权力体系建立、党派斗争等迫切问题。这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追踪研究，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并对发展趋势做出预测。由于俄罗斯处于急剧变化当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俄罗斯政治本身还不够成熟，因此，本学科在当时也处在发展和逐步形成过程中。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变化，到叶利钦总统辞职前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逐

渐扩展，研究不断深入，从开始时集中于政治领域特别是联邦中央权力斗争的研究，扩展到对联邦制及地方问题、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政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思潮、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从一般的形势分析研究，转向对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理论探讨，进而对俄罗斯转轨及发展道路做出理论总结。2002年，借助研究所改名和建立重点学科管理体系的契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阶段。

### 重点学科建设大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研究所改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之前，1999年，研究所根据学科布局的实际需要，采取按研究领域与按地区研究划分相结合的思路，将俄罗斯学科及俄罗斯研究室按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划分为三个学科（俄罗斯政治学科、俄罗斯经济学科、俄罗斯外交学科）并建立相应的研究室作为依托（俄罗斯政治室、俄罗斯经济室、俄罗斯外交室）。俄罗斯政治室正式成立。2006年，本所出台的“十一五”科研规划提出巩固传统学科的治所方针，要求俄罗斯政治室加强对俄罗斯社会与文化问题的研究，“俄罗斯政治室”因此正式改名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室”。

从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以来，“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一直入选院重点学科。我室出版了《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俄罗斯之痛——“车臣问题”探源》《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宪政之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最高权力的组合》《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政治卷）》《观念与制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治理》等近20余部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从2002年开始，本学科在研究内容的专业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体系的系统性等方面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做好追踪研究的同时，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把握“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学科性、理论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对俄罗斯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回答已经超越了世界史上已有的对人类大转型时期制度变迁路径的总结。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属于大国治理类型。大国治理问题本来就是俄罗斯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课题。研究俄罗斯问

题，不仅需要俄罗斯的视角，更需要全球的视角，需要研究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问题，需要反思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然而，即使有了上述研究，依然不能完全回答俄罗斯形势发展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俄罗斯形势发展本身，倒逼我们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必须具备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由点及面，见微知著，不断积累，逐步提升，最后达到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战略分析和综合研究的高度。

###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内容与方法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对俄罗斯国家权力结构的研究，内容包括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俄罗斯国家权力配置的运行及其变化、国家立法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设置与组成情况、议会内部组成与议会党派的活动等；第二，对俄罗斯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历史沿革、联邦制度的调整完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车臣问题等；第三，对俄罗斯政治生态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变化、俄罗斯主要政党发展状况、“统一俄罗斯党”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发展变化等，还包括俄罗斯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发展变化，国家杜马历届选举的主要过程、结果及其影响等；第四，对俄罗斯精英的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各领域精英的出现、分化、更新换代以及对转型的影响等；第五，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第六，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及国家特性的研究。

未来将继续加强“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对以下核心问题的研究：第一，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特点及发展道路的选择；第二，政治发展的经济影响因素，即垄断性经济结构与政治集权之间的关系；第三，政治发展的国际关系因素，即俄罗斯精英的国际政治观及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转型与发展的影响；第四，政治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即保守主义取向的社会国家性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第五，政治发展的文化因素，即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国家特性与政治治理之间的相关性联系；第六，政治发展的历史因素，即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俄罗斯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一条红线。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当代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也是俄罗斯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在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

“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系统研究。重视史实资料的系统性，重视对俄罗斯发展横向线索与纵向脉络的把握，重视对俄文原始文献的实证性研究。资料的基础性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同时，也要非常重视对英文文献的阅读，注意理解西方学者基于俄罗斯历史沉淀来分析当代俄罗斯政治与未来前景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系统性有利于形成历史思维，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通过掌握事物运动的全过程，实现研究工作中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第二，综合研究。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诸方面，这需要在跨学科基础上加强综合性研究，理解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战略思维，把握住影响俄罗斯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除了学科的综合，还要有全球、地区与国别三个研究层面的综合意识。仅仅了解一国和地区的事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时代特征。

第三，理论研究。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需要运用一定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掌握理论对于研究俄罗斯问题是有用且必要的。现代政治学是人类研究政治行为思想的结晶，其基本原理、视角和分析工具是需要运用的。将现代政治学作为参照系，才能把俄罗斯问题放在一个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上，才有可能在研究中体悟出哪些是一般性的规律问题，而哪些又具有研究对象国的特殊性。当然，仅仅运用理论是不够的。科学研究上升到理论是研究过程的飞跃和归宿。需要把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再认识重新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 二 “俄罗斯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所建立之时隶属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我所对苏联经济研究的重要主题是对苏联社会经济模式的认识和再认识。我所学者就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苏联的现代化模式等重大理论问题撰写了大量内部报告。俄罗斯经济（苏联经济）学科的建立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1981年我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俄罗斯经济（苏联经济）学科蓬勃发展，成绩斐然。



## 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改革的研究

我所在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不仅如此，该时期的研究同时也为国内苏联经济学科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引领作用。当时推出的不少作品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影响了以后的几代学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同志指示学术界写出100本书，介绍国外（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情况和经验。当时隶属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很受鼓舞，全所立即组织科研力量，展开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的全面调研。

1981年苏东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至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研究突飞猛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苏联经济学科兴旺发达的时期。该时期，从事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在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孜孜以求，不计报酬，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展开全方位的探讨和钻研，提出了大量具有深邃见解的观点和看法，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专著、论文、文章、研究报告，翻译和撰写了一批译著、译文和工具书，有效地配合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较好地发挥了中央期待的“参谋”“智囊”作用。在开始阶段，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撰写内部报告，另一方面是翻译编写有关苏联经济及管理体制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很多成果不能公开发表、公开讨论，所以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以《苏联东欧情况》的内部报告形式上报，发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各部委，供上级决策部门参考。从70年代末到苏联解体前，我所每年出《苏联东欧情况》80余期，在十多年里撰写的内部报告有1000余篇，其中涉及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达300余篇。具有代表性的有《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发展》，这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分四期发表，后被收入1981年时事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经济体制问题》一书中。在撰写内部报告的过程中，我所还组织翻译出版了不少有关苏联经济及管理体制的资料，并且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一些简称《译丛》，后改为《东欧中亚问题译丛》）的形式由三联书店连续分辑出版。1981年，我所创办学术期刊《苏联东欧问题》，经过两年试刊后于1983年正式发行。整个80年代，为适

应形势发展需要，刊物的主要选题一直以苏联经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该期刊引领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期刊还设有“专题讨论”栏目，就某一现实问题或前沿问题刊载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思想。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的苏联经济问题研究方面，我所的科研成果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位于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十多年间，我所研究人员在所内及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有 200 多篇。当时国内出版的关于苏联东欧问题的 20 多部论文集都有我所研究人员参与。其中主要有：《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 年），《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 年），《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 年），《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等。

同时，我所还主持出版了一些涉及苏联经济的工具书及译著，如《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年，共计 66.5 万字），《苏联财政》（M. K. 舍尔麦涅夫主编，毛蓉芳、陆南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年），《政治经济学》（B. A. 梅德韦杰夫等编著的苏联高等学校教科书，高中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等。

80 年代初开始，苏联东欧研究所开始承担国家和有关部门的一些重点课题，苏联经济室承担的课题居多，课题完成后大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这一时期，我所主持和出版的国家重点课题和专著主要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系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课题，由刘克明、金挥主编，组织所内外多名专家学者用七年的时间共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共计 58 万字），《苏联经济概论》（受教育部委托为高等院校撰写的一部教科书，由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以我所经济室为主，组织国内几所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共计 67.4 万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苏联经济简明教程》（陆南泉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的一部高等院校文科简明教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年，全书共计 28 万字），《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辽宁人

民出版社，1982年，全书60万字），《战后苏联经济》（金挥、陆南泉主编，苏东所经济室共同参与撰写，时事出版社，1985年，全书31万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杨家荣、张森撰写，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全书20余万字），《苏联改革大思路》（陆南泉主编，张础、刘清鉴和高中毅等共同撰写，沈阳出版社，1989年，全书30多万字）。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三类。

一是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进行综合研究。代表作有：专著《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苏联经济概论》；论文《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概况》（载于《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发展》（载于《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趋势及其主要症结》（载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7期）等。

二是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进行的专题研究。学者们对一些中观和微观的专题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了体例不同的研究成果。如杨家荣、张森等撰写的专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以及一大批专题论文，如刘清鉴的《苏联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载于《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挥的《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载于《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张础的《苏联80年代经济结构变化趋势》（载于《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和《探讨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个问题》（载于《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

三是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主要的论文集有《苏联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陆南泉、高中毅、张础、刘清鉴等）；主要的论文有吴仁彰的《关于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1983年）、《苏联的超越阶段思想和经济改革》（1985年）、《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初探》（1985年）等。

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但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的研究却远未结束。如今，无论是探讨苏联解体，还是研究今天的俄罗斯，乃至中国借鉴外国的改革经验，都离不开对当年苏联经济及其体制问题的研究。